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

主编 黄琦 刘学军

大国反腐

王 平◎主编

何家弘 | 李永忠 | 马怀德 | 吴建雄 | 姜明安

多位名家纵论改革大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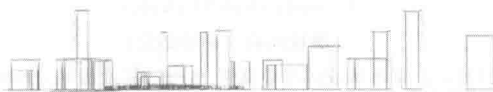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

主编 黄琦 刘学军

大国反腐

王 平◎主编



何家弘 | 李永忠 | 马怀德 | 吴建雄 | 姜明安

多位名家纵论改革大势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反腐 / 王平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9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黄琦, 刘学军主编)

ISBN 978 - 7 - 5095 - 7685 - 4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反腐倡廉 - 中国 - 干部教育 - 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63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2421 号

责任编辑: 党海鹏

责任校对: 徐艳丽

封面设计: 田 晗

版式设计: 齐 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 // www. cfeph. cn](http://www.cfeph.cn)

E - mail: [cfeph @ cfeph. cn](mailto: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8. 25 印张 284 000 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 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685 - 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文章稿酬及版权联系电话: 010 - 68457872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14 QQ: 447268889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

编 委 会

顾 问：高尚全 彭 森 宋晓梧 许宏才 刘尚希

编委会主任：周法兴 史克毅 黄 琦 潘治宏

编委会副主任：蔺红英 刘学军

编 委：周法兴 史克毅 黄 琦 潘治宏 蔺红英

刘学军 贾存斗 党海鹏 郁东敏 翁晓红

丛 书 主 编：黄 琦 刘学军

分 册 主 编：刘学军 王 平 黄根兰 方 艳 秦均华

赵 琳 孙 铮

总 序

高 尚 金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近 40 年的光辉岁月。近 40 年来，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们从无到有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进行完善，我们扭转了“文革”的动荡混乱走向依法治国，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事业当然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但是改革的开拓却从未停歇。战胜这些困难、推动中国改革不断进步的，是站在改革潮头的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是我们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前进的中坚力量。从“要吃米、找万里”的童谣到“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习仲勋等早期的特区开拓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证和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的构建，如果没有党员干部对改革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就没有今天改革事业的辉煌成果。

一、坚持市场方向的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近 40 年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改革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最终使得国家在各个层面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

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这五个方面的伟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制定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以这份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定》为基础，中国改革事业在战略布局、改革难点以及市场地位方面都获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乃至突破。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获得重大突破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就是从以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逐渐变革成为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进程当中，市场的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世界经济严重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洗牌”。与此同时，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继续进行深刻的调整 and 改革。中国经济面临着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和调结构的两难困境。在这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央及时作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决定和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

（三）国家政治体制顶层设计适应新的要求、获得新的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求对过去领导改革的行政部门本身进行改革，对改革领导者的决策效能和执行力提出了重大考验。为了推进改革，中央先是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决策效能，使过去总是被回避的改革议题，比如户籍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能够集中力量摆脱各种利益羁绊获得正面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高还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上。全面深化改革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通过各项制度建设，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总目标。

（四）反腐倡廉成效显著，依法治国有效推进

进一步推进改革，创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需要廉洁奉公高效的党员和公务员队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查处，破除了过去一段时期因党纪国法松懈而滋生的各种潜规则，横扫了贪腐猖獗的不良风气，党纪国法为之肃然而振！中央对于滥权渎职的腐败分子，上至中央常委，下至乡村干部，不管是军方大将，还是地方大员，但凡触犯党纪国法，均依法予以严惩。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这样大规模的反腐浪潮，激浊扬清，民心得以振奋，党风得以清正，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掌握权力行使权力的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地规范行使权力、自觉避免滥权渎职行为，这为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肃清腐败的基础上，中央通过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从制度建设上、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2014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

（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创造绿色环境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清晰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后的又一大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

密集推出，体现了党遵循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期待、彰显执政担当。

二、新时期的改革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其在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健康。

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出的，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中央深改办也专门出台了各项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

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凡此种种，彰显了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三、改革只有进行时，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掌握改革的方法和经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千千万万的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面对“啃硬骨头”的难题，而且要面对的往往是改革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艰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决策层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做好微观改革激励兼容的改革路径设计之外，还需要各个层级的党员干部增强大局意识、核心意识，自觉向中央看齐，其目的就是要发挥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优势来克服私利对改革的扭曲，这是当前推进改革所需要的，是当前各项党员学习教育培训项目的重中之重，在此无须赘言。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改革的深水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在制度架构的诸多方面可能不再适用，党员干部在坚定改革的决心之外，还有必要掌握改革的方法论，在对改革有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掌握推进改革的方法、路径，这样就能够事半功倍地推进改革。在近4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方法，突出的有：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

二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也是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回顾中国近40年的改革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订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订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订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地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不动摇。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

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当然，宏观上掌握了改革的经验和方法还远远不够，广大党员干部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具体的改革领域。这些具体领域的改革都有自己的难点和重点，其改革的方法和路径都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这次共同编纂出版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仅仅包括宏观的内容，如《未来十年的改革发展战略》《大国反腐》《大市场严监管》，因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有利于我们构建对当前整个改革进程的认知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还就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社保改革、产业变革、扶贫攻坚等具体改革领域都专门整合了分册，共同构成本丛书的主体内容，这就为广大党员干部在各自的领域学习、推进改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相信，只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深刻地学习和领悟“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这样的改革书籍所传递的改革知识和精神，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2017年9月

代序 反腐新常态	庄德水 (1)
----------------	-----------

第一篇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 / 11

转型期中国严重腐败犯罪的表征、惩治得失及对策	任建明 (13)
从国际和历史视角正确看待当前反腐形势	葛 平 (23)
反腐败工作机制改革的几个重点问题	姜向红 王希鹏 (27)
反腐败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评析	张祖钧 张乾元 (36)
当前我国反腐败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及其困境	贾利亚 (47)

第二篇 制度反腐：如何走出反腐困境 / 57

“三位一体”迈向制度治腐之路	许耀桐 (59)
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力错位和权力失控	包心鉴 (65)
“五位一体”的廉政新常态体系建构	李景平 (71)
从人民代表大会制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焦洪昌 叶远涛 (77)
反腐败立法建议	何家弘 张小敏 (82)
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	聂辉华 仝志辉 (109)
问责与容错	竹立家 (129)
权力清单视角看深入反腐败	郭 瑞 (134)
政府审计如何在反腐败中发挥作用	李明辉 (149)

第三篇 聚焦监察体制改革 / 165

权力结构改革与监察体制改革 李永忠 (167)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 马怀德 (171)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维护国家纲纪发挥的重要作用 张晋藩 (184)

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经验及改革建议 蒋来用 (195)

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与实现路径 吴建雄 (209)

中国县级纪检监察机构的现状、困境与改革思路
..... 过 勇 宋 伟 (215)

国家监察法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 姜明安 (227)

第四篇 古今中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 241

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对策 张乐贤 (243)

古代反腐文化给当今的启示 于永军 (251)

康雍乾时期尝试的制度反腐 霍玉敏 (255)

俄罗斯反腐败措施及其启示 迟连翔 齐晓安 (260)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制度架构及启示 刘国新 刘 瑜 (271)

反腐新常态

庄德水*

反腐新常态是对当前中国反腐进入新阶段、面临新任务的一种提升和概括，意味着中国反腐已日渐告别旧有的反腐模式和思路，正在探索具有本土化和时代性的反腐道路。反腐新常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正风肃纪、打虎灭蝇，刷新反腐数据，而在于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辟新路。也只有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才能让反腐真正进入一个新常态，体现“新”的特质，保持“常”的潜质。

一、革新权力结构

论及反腐新常态，首先离不开权力及其结构问题。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授受、使用、配置以及监督之间的相互关系，代表了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决定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合理的权力结构取决于权力分工是否科学、权力配置是否规范、权力制约是否到位以及权力运行是否顺畅等。权力结构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随着政治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并寻求结构要素之间的平衡点。

* 庄德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革新权力结构是反腐新常态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在反腐新常态中，中国政府革新权力结构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权力限制，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二是权力公开，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三是巡视监督，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是否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是否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在传统全能主义国家体制中，权力结构具有高度集权性，实行“一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一元化”事实上变成了“一人化”，权力集中于特定的领导个人，产生严重的权力人格化现象。对此，邓小平有过论述：“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处于失衡的权力结构和网络中，权力的运用没有明确的约束边界，特定领导的个人意志可以随意越出法规制度的限制，以人代法、以言代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权力成为唯一的权威代表。特定领导利用权力可以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垄断并主导利益的分配，把权力视为个人财富，谋求权力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社会公众难以参与权力资源的分配，缺乏制衡特定领导的监督权力。

当前，中国权力结构面临着革新压力，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改变

了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势能”对比，新兴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打破了单极化的权力控制和单向性的人格依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公众对权力运行的认知和期望也发生重大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已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旧有的权力关系特征成为束缚政治发展的障碍。人们呼唤权力结构的革新并希望之融入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战略和治理愿景之中。权力结构革新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变迁，不如说是政治秩序的重建，改变授权无序、有权无责、用权无界的状况。权力结构具有“制度惰性”，到目前为止，主动性的“华丽转身”只是一种理想。当前自我革新的内源性力量仍显不足，其原因在于强势权力主体出于利益考虑难以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进行分化。而外源性力量受旧有体制限制难以行使权利，一时难以突破权力结构的壁垒。摆脱权力结构的“路径依赖”需要反腐作为倒逼机制，倒逼强势权力主体改变对权力收益的心理预期，作出行为纠偏，放弃部分权力资源和特殊利益。

反腐新常态是权力结构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合理的权力结构是反腐新常态所欲求的价值。权力结构是反腐新常态形成的一个制度性条件，关系到反腐主体能否积极参与、反腐机制能否协调运转、反腐手段能否有效运用等。反腐新常态不需要一个小打小闹或小修小补的权力结构，而是需要一个契合政治顶层设计的权力结构，保证反腐触及权力体系的核心，扭转权力配置关系和格局，切中腐败行为的要害。反腐新常态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只有将制约权力问题转化为一个权力的结构问题，对权力的制约才是可能的”。没有合理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权力制约将失去依托，反腐新常态将可能重返旧常态。可以说，权力结构能否从失衡走向合理，决定了反腐新常态的生命力。

二、调整利益格局

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利益是决定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反腐说到底是对原来利益的重新配置和分配的过程。所谓利益格局，是指不同社会成员和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和占有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化关系形态，表现为权利、责任、义务、行为和交往方式等的制度化规则。利益格局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影响力，

也代表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利益格局代表了一种关系，也代表了一种权利，即是对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利益表达是一种政治输入，旨在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影响政治系统的政治输出。政府则在这一过程中对各类利益进行协调与综合并最终实现整体性利益。一旦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或控制，政府政策导向将会发生偏差，导致利益格局的失衡，激化社会矛盾。

利益格局调整总是伴随着全面性的体制变革，“体制变革的实质就是利益格局调整”。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固有的利益关系束缚着人们的行为，旧有的利益集团仍占据着分配的优势，新的利益格局与旧的利益格局处于交锋和矛盾状态。当前中国利益格局之所以不合理，其要害在于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抵抗。利益集团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评价其是否具有进步性，主要看其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契合。“我们现在说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指利用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利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利益。表面现象看，特殊利益集团是个行业、部门问题，但实质上是权力垄断的问题。”可以说，权力垄断是当前特殊利益集团主要特点，它们利用其权力优势垄断了社会资源并主导了资源配置，并且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来阻挠改革的进展。更严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会在政府部门内部寻求利益代言人，以获取权力的支持和庇护。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是“分配性”的，总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各种改革采取消极抵触的态度，竭力维护本集团所占有的利益。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实现强势权力与强势资本的共谋合作，共同掠夺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

在反腐新常态中，反腐要获得社会公众支持，除保持高压反腐态势之外，还需实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反腐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增进利益是反腐的一个落脚点。人们评价反腐是否具有成效，除了一系列查办案件和被处理人员的数据外，还要看反腐是否给自身带来实际利益、幸福感是否提升以及是否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理，反腐离开利益格局的调整，就会使其失去利益依托并陷入空转。特别是在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